

浙江文叢

朱彝尊詞集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朱彝尊詞集

〔清〕朱彝尊 著
屈興國 袁李來 點校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朱彝尊詞集 / (清)朱彝尊著;屈興國,袁李來點校.——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1.9

ISBN 978-7-80715-749-6

I. 朱… II. ①朱… ②屈… ③袁… III. 詞(文學)—作品集—中國—清代 IV. I222.84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資料核字(2011)第 171144 號

朱彝尊詞集

[清]朱彝尊 著 屈興國 袁李來 點校

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

(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:310006)

網 址 www.zjguji.com

責任編輯 錢偉彊

封面設計 劉 欣

責任校對 余 宏

照 排 浙江新華圖文製作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

開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張 36.5

字 數 400 千

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書 號 ISBN 978-7-80715-749-6

定 價 120.00 圓(精裝)

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,影響閱讀,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。

ISBN 978-7-80715-749-6



9 787807 157496 >

前言

清初詞學，突過元明，高才輩出，並軌揚芬，呈現復興氣象。

據南京大學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粗略的統計，僅順治、康熙兩朝的詞人，便逾兩千家，詞作在五萬首以上，可見其興盛發達之一斑。

在這兩千多家詞人中，朱彝尊可謂翹楚。杜詔《彈指詞序》說：「竹垞神明乎姜、史，刻削雋永，本朝作者雖多，莫有過焉者。」王初桐《小嫿嬛詞話》卷三則推崇為「五百年來第一人」。晚清詞論家況周頤在其《蕙風詞話》卷五中說：「或問國初詞人當以誰氏為冠？再三審度，舉金風亭長對。」雖不無過譽之虞，亦可覘其詞壇之地位。

一

朱彝尊字錫鬯，號竹垞，晚號金風亭長，又號小長蘆釣魚師，因排行第十，又自稱布衣朱十，浙江秀水（今嘉興市）人。生於明思宗崇禎二年（一六二九）。曾祖國祚曾官光宗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，但到彝尊出生時，家道已開始中落。崇禎十三年（一六四〇）浙東西大旱，饑民相食，他家也到了「貧至絕粒」的境地。傳說彝尊讀書里中時，曾與

周賔、王翊、沈進、李良年兄弟等爲詩課，家僅有一布袍，遇會則付質庫，得錢爲集飲之資，嗣由其婦以紡織贖出，率以爲常（見楊謙《竹垞年譜》）。可見他的青少年時期是在貧困中度過的。

明清易代之際，首先是農民起義席卷全國，繼之滿族鐵騎由北而南，抗清鬪爭連綿不斷，民族矛盾急劇上升。由明末發展起來的士大夫結社活動，入清以後，也從過去的干預朝政，朋黨之爭，轉向反清復明。名爲以文會友，實乃聯絡抗清。順治七年（一六五〇）嘉興南湖的十郡大社，集會時連舟數百艘，聲勢浩大，連知名度很高的吳偉業都到場了，彝尊也隨着小叔朱茂凋參與盛會。這次大會雖沒有什麼實際成效，但朱彝尊却看到了江南廣大士子思念前朝的普遍心理，增強了他的抗清意識。是時彝尊早已放棄了舉業，盤據在胸中的只有恢復大業，於是便去山陰，聯絡祁理孫、祁班孫兄弟，也就是以殉明節而著稱的祁彪佳的兩個兒子。當時，祁氏兄弟正聯絡同志，共圖起事，却因同夥魏耕入獄，事泄遭厄，朱彝尊也因此逃匿，蟄居永嘉，直至事解返里。

壯年的朱彝尊，開始了他一生中最有意義的遠游時期。《靜惕堂詞序》說：

彝尊憶壯日從（曹溶）先生南游嶺表，西北至雲中，酒闌燈地，往往以小令慢詞更迭唱和，有井水處，輒爲銀箏檀板所歌。

又《紅鹽詞序》說：

予糊口四方，多與筭人酒徒相狎，情見乎詞，後之覽者，且以為快意之作，而孰知短衣塵垢，棲棲北風雨雪之間，其羈愁潦倒，未有甚於今日者耶！

這就將自己的生活、創作以及內心痛楚和盤托出了。

他從二十八歲游嶺南始，先後出雲朔、泛滄海、走京華、客濟南，歷時二十餘年，足迹遍及今天的華北、華東、華南地區，馳逐車塵，目擊民生疾苦，飽嘗世態炎涼，情鬱於中，輒發為歌詩。同時，也游覽名勝，憑弔古迹，蒐考遺聞，參徵經史，儲積資料，為後來著書立說打下基礎。而在思想上，儒家的人世觀，日益萌動，他在《弔李陵文》中說：「賈生（誼）之才，文帝不善用，為世所惜；若武帝之於（李）陵，用違其才，殆又甚焉。」從而慨嘆「才子不遇於世」，無異夫子自道，可見其用世之志。

康熙十七年（一六七八）彝尊五十歲，應博學鴻詞舉，後授翰林院檢討，充明史纂修官，升日講起居注官，典江南鄉試，入直南書房，賜第黃花門，殊受恩寵。二十三年（一六八四）却因攜帶僕人私人內府鈔錄經進書，被劾降級，徙居古藤書屋。二十九年（一六九〇）補原官，後二年復以事被黜免，遂告老歸里，結束了宦海生涯。餘年則以課孫著書自娛，編《經義考》三百卷、《明詩綜》一百卷、《曝書亭集》八十卷等，康熙四十八年（一七〇九）辭世。

綜觀朱彝尊的一生，其所經歷的幾個階段，也是同時代大多數知識分子普遍循行的軌

轍。初起清兵入關，血腥的屠殺和殘酷的鎮壓，激起強烈的民族抗爭意識；隨着清朝統治的鞏固和加強，勢去時非，鬪志逐漸消弭，轉而追求功名富貴；經過官場的角逐，復驚怖於迭興的文字獄，於是退處書齋，埋首於古籍的考索編纂。他在《書花間集後》中說：「《花間集》十卷，蜀衛尉少卿趙弘祚（按當爲趙崇祚）編，作者凡十七人（按今本凡十八家）。蜀之士大夫外有仕石晉者，有仕南唐南漢者……選者不以境外爲嫌，人亦不之罪，可見當日文網之疏矣。」是針對當時文網之密的慨嘆，其心態不難感知。

一一

彝尊以學富才高、文備衆體著稱，李元度撰《事略》云：「時王漁洋工詩而疏於文，汪茗文工文而疏於詩，閻百詩、毛西河工考證而詩文皆次乘，獨先生兼有諸公之勝。」（《國朝先正事略》卷三十九）這是事實。然而，真正超越他們的還是詞。所舉四人中，汪茗文、閻百詩不以詞名。漁洋能詞，且早享盛名，惜乎神龍見首不見尾，後來不作了。毛奇齡追步《花間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填詞提要》譏爲「纖巧」、「淺薄」。總不若彝尊標舉醇雅，開一代詞風的影響深遠。

以下，試對現存朱彝尊的幾個詞集，分別略加評介。

他在《書東田詞卷後》說：「予少日不喜作詞，中年始爲之，爲之不已且好之。」所謂

「少日不喜作」，不等於說不作，不過是不像中年那樣「好之」而已。《眉匠詞》一卷，五十首，據況蕙風說，即爲朱氏少作。我們同意況氏的判斷，因爲這些作品，尚未脫摹擬窠臼，語病、失律、故意作態，時有所見，內容更是貧弱。昔人嘗有「悔其少作」之說，這應當是彝尊晚年編集不加收錄的原因。然而，它却爲詞學研究者提供了珍貴的資料。借此可以窺見彝尊作詞的發展過程和當時詞壇風尚之一斑。

《眉匠詞》短調大都學唐五代，長調大都學南宋；前者是雲間派的嗣響，後者是新闢的蹊徑。

今上海市松江地區，古稱雲間，明末其地陳子龍、宋徵輿、李雯、吳騏、計南陽等大批知名之士，不滿明代一些詞人宗尚《草堂詩餘》，追求尖新儇巧的作風，而改學南唐北宋，能於「繁促之中，尚存高渾」（陳子龍《幽蘭草題詞》）。後繼者如蔣平階、周積賢等人，益形凌厲，直說「五季猶有唐風，入宋便開元曲」（沈億年《支機集·凡例》）。從而摒棄宋調，直追《花間》。雲間與秀水，地近咫尺，少年朱彝尊的詞學起步不能不受其影響，《眉匠詞》中的短調，就是這短暫歷史的腳印。

雲間詞人專意於小令，長調創制極少，不足以開拓境域，朱彝尊則通過自己的探索，找到了學南宋的路子，我們不妨讀一讀《法曲獻仙音》的下片：

擬延伫。領詩情、煙鐘津鼓。奈笠澤閒鷗，喚人東渡。一笛葦花風，便吹送、客程幾

許。水驛燈昏，怕江猿、啼盡愁苦。任幽恨、散入淡雲空渚。

通過眼前景物，將倦客的歸思，婉轉含蓄地傳出，結以迷離之境。這與南宋詞人姜夔的風格，所謂「不惟清空，又且騷雅」（張炎語）是很相近的。彝尊的長調，一開始走的便是姜（夔）張（炎）的路子。

《江湖載酒集》，命名取杜牧《遣懷》詩「落拓江湖載酒行」，其中固多表現狎邪冶游之作，趣味庸俗，殊不足取；然而，並存集中的登臨懷古、客游酬贈之作，則充分體現了作者的才思和風貌。

在懷古諸作中，作者通過歷史的畫廊，抒發了前朝覆滅的感慨，追憶殉國英雄的業績，寄托了自己的故國之思。如《風蝶令·石城懷古》、《百字令·度居庸關》、《水龍吟·謁張子房祠》、《滿江紅·吳大帝廟》等均為代表作。

它們是《曝書亭詞集》中的精品，大都寫得兀傲蒼涼，慷慨悲壯，却又不涉及叫囂，不流於散漫，與一味以豪放見長的陳維崧相比，似乎更深沉一些，可惜的是數量不多。

朱彝尊飢驅萬里，浪游四方，其客居詠懷和投贈之作，在本集中所占分量較重，也更能體現其醇雅的特色。如《菩薩蠻·登雲中清朔樓》、《摸魚子·寄龔蘅圃》諸闕，情深意長，自然瀏亮，有不期然而然之妙。

《靜志居琴趣》一卷是別開生面之作。其有關詞之本事，歷來衆說紛紜，有謂「羌無故

實」，「未必真有所指」（丁紹儀《聽秋聲館詞話》卷二）；有謂「蓋真有本事」，「皆《風懷》注脚也」（冒廣生《小三吾亭詞話》卷三）。見仁見智，各言其是。

彝尊的妻妹名壽常，字靜志，貌美善書，彝尊曾與之相戀。詩集中的《風懷二百韻》及《靜志居琴趣》詞，都是爲她而作的。

明至清初，艷詞泛濫，大量充塞着的是酒樓歌榭的狎妓之作，輕薄粗鄙，虛情假意。間有閨闈情事，亦不免「第言姚冶，易近纖佻；兼寫幽貞，又病迂腐」（陳廷焯《白雨齋詞話》卷六）。但在朱彝尊筆下，却出現了端莊嫻靜的窈窕淑女，心心相印的愛情描寫，這就將所謂艷科升華到高尚的情操的表現，展現出新的光彩。正如李符《江湖載酒集序》中說的「集中雖多艷曲，然皆一歸雅正，不若屯田樂章徒以香澤爲工者」。

這一時期的情詞，絕大多數是單篇，互不關聯。《靜志居琴趣》一卷八十三首，却是圍繞一人一事而寫。錢斐仲《雨花庵詞話》說：「迷離惆恍，若近若遠，若隱若現，此善言情者也。若忒煞頭頭尾尾道來，不爲合作。」優點固如是言，其所謂「頭頭尾尾道來」的缺點，却正是此卷的最大特色。雖然其中有難言之隱，不得不亂以他詞，然細按之，脈絡仍隱約可見。至於《洞仙歌》十七闋，則「是計其始終，而歷叙悲歡離合之情」（陳廷焯《白雨齋詞話》卷三），可謂創體。後來雖有董以寧因眷一婢而作《東坡引》十章，趙文哲因戀一姝而作《祝英臺近》八章等，但格調稍遜，均不能與朱媲美。

明至清初之艷詞，設色雖濃，造境却淺。《靜志居琴趣》却獨具風韻，給當時詞壇，吹進一股清新淡雅的幽香，沁人心脾。所以陳廷焯《白雨齋詞話》卷三說：「吾於竹垞，獨取其艷體。」

這一卷詞與《曝書亭集》中的《風懷二百韻》確實是同一題材的不同文學樣式。朱彝尊自己說：「蓋感知己之深，不禁長言之也。」（《靜志居詩話》）《靜志居琴趣》也同樣是深懷知己之作。丁紹儀《聽秋聲館詞話》卷二引翁方綱說：「太史欲刪未忍，至繞几回旋，終夜不寐。」可以想見其思想鬭爭的激烈。然而朱彝尊自己曾說：「寧可不食兩廡冷豬肉，不刪《風懷二百韻》！」那末他之終不忍刪《靜志居琴趣》也就不言而喻了。

《茶煙閣體物集》是詠物詞。詠物之作的較高境界，在於借物寓情，而非斤斤於刻畫某一事物的本身。從南宋發展起來的詠物詞，多數是寄寓作者的身世之感或家國之憂的。因憤慨於楊璉真伽發掘宋帝后諸陵的暴行，宋末遺民唐珙、林景熙等人，借詠物小題以寫滄桑之痛的《樂府補題》，就是這一題材的突出代表。

據毛奇齡《鷄園詞序》說：「《花間》、《草堂》，各不相掩，其後迦陵陳君，偏欲取南渡以後，元明以前，與竹垞朱君，作《樂府補題》諸倡和，而詞體遂變。」可知朱彝尊寫詠物詞是從效法《樂府補題》入手的。集中有《天香·龍涎香》、《水龍吟·白蓮》、《臺城路·蟬》、《桂枝香·蟹》、《摸魚子·蓴》等，均為《樂府補題》舊題的仿作。細繹詞意，這些作

品並沒有較爲明確的言外寄托，基本上局限於所詠之物本身，「縱極工巧，終無關風雅」（陳廷焯《白雨齋詞話》卷三）。時際明清易代，與宋末唐珣等所處時代類似的朱彝尊，其所詠物背離了宋元之際的優秀傳統，很令人失望。

其他題目，除少數如《長亭怨慢·雁》一闋，被陳廷焯譽爲「以淒切之情，發哀婉之調，既悲涼，又忠厚，是竹垞直逼玉田之作」（《白雨齋詞話》卷三）外，絕大多數均無寄意，而以細緻地描摹物態取勝，總以侔色揣稱爲能事，以致被評家譏諷爲「方物略」，「群芳譜」（謝章铤《賭棋山莊詞話》續編二）。其中刺取典實，夸富矜多的《雪獅兒·詠貓》四首，則不僅是「爲有苗氏作世譜」（謝章铤《賭棋山莊詞話》卷九）的獺祭之作，且開浙西詞派狂徵僻典的弊端。《沁園春·擬艷》十二首，分別詠額、鼻、耳、齒、肩、臂、掌、乳、膽、腸、背、膝等，前人譽爲「靖節《閑情》之遺」（王初桐《小嫿奴詞話》卷三），那不過暴露了評論者自己庸俗無聊的低級趣味而已。

《蕃錦集》一百多首詞，是集唐人詩句所成。集句之風雖始於宋代的王安石和蘇軾，也只是偶一爲之，不像朱氏這樣競奇鬪妍，沾沾自喜。儘管陳廷焯在《白雨齋詞話》卷十中說它是「脫口而出，運用自如，無湊泊之痕，有生動之趣，出古人之右」。謝章铤在《賭棋山莊詞話》卷十二中說它是「神工鬼斧」，「真絕唱哉」！但實際上不過是「佳則僅一斑斲衣，不佳且百補破衲耳」（《遠志齋詞衷》引賀裳說）。更重要的是文學作品中的生活氣息，時代

脉搏，都由於只能借用成句，不能自出心裁而受到極大的限制，充其量不過是一種高級的文學遊戲而已。

綜觀《曝書亭詞集》，正如盧前《望江南》所題：「《蕃錦》《茶煙》無足取，《靜居》《載酒》《未容詞》」（《清名家詞》後附）。在那階級鬭爭和民族鬭爭交織激化，「兵氣漲乎雲霄，刀癥留於草木」的時刻，朱彝尊却不敢將親身經歷在詞中反映，懾伏於異族的統治，違心地低徊於文字遊戲之中，是有愧於時代和人民，也有愧於同調和自己的，這不能歸咎於詞這種文學樣式的局限，却與他的文學主張有密切的關係，雖然並非全部的原因。

三

《曝書亭詞》雖然在內容上有着如上所指陳的根本性的缺陷，但在藝術上則句琢字煉，歸於醇雅，在清初詞壇，一新面目，領袖群芳，獲得了交口稱贊。而朱彝尊所提倡的理論及實踐，也導致了詞壇風尚的改變，進而形成浙西詞派，使他在清前期處於一尊的地位。

朱氏詞論的核心就是標舉「醇雅」。他說：

念倚聲雖小道，當其為之，必崇爾雅，斥淫哇。（《靜惕堂詞序》）

蓋昔賢論詞，必出於雅正，是故曾慥錄《雅詞》，鮑陽居士輯《復雅》也。（《群雅集

序》）

蓋詞以雅為尚。（《樂府雅詞跋》）

言情之作，易流於穢，北宋人選詞，多以雅為目。（《詞綜發凡》）

周公謹《絕妙好詞》選本雖未全醇，然中多俊語，方諸《草堂》所錄，雅俗殊分。（《書絕妙好詞後》）

由上可見，他從詞的基本要求、歷史傳統，直至樹立風標，都在反復闡明詞以醇雅為尚。

風格的形成，不但基於作者的個性，也有賴於從歷史上已積澱的傳統汲取營養。朱彝尊就是通過宗法南宋、推尊姜張的途徑，密切結合自己的個性，從而使自己的作品臻於醇雅的。按他自己的話說，這是「涉大水獲舟梁之術」。

朱彝尊推尊姜夔，認為「填詞最雅無過石帚」（《詞綜發凡》），「詞莫善於姜夔」（《黑蝶齋詞序》），如張輯、盧祖皋、史達祖、吳文英、蔣捷、王沂孫、周密、陳允平、張翥、楊基等，這些由南宋至明的有成就的詞人，只是「具夔之一體」（《黑蝶齋詞序》）而已。在他的心目中，姜夔儼然是詞中的杜甫了。然而在實踐中他却更喜歡追步張炎，所謂「不師秦七，不師黃九，倚新聲、玉田差近」（《解珮令·自題詞集》）。認為張炎「足與白石老仙相鼓吹」（仇遠《山中白雲序》）。姜張並稱，是歷來所公認的，所以彝尊及其追隨者，就必然推尊姜張了。

怎樣學習姜張呢？彝尊未道其詳，只是在《孟彥林詞序》中籠統地說：「綺靡矣而不戾

乎情，鏤琢矣而不傷乎氣，然後足與古人方駕。」這些話雖極圓通，却難以捉摸。與他聲氣相通的汪森則說得比較明白，《詞綜序》說：「字琢句煉，歸於醇雅。」這是他們從創作實踐中體察有得之言。

次則宗法南宋。如說：

世人言詞，必稱北宋。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，至宋季而始極其變。（《詞綜發凡》）

竊謂南唐北宋，惟小令為工，若慢詞，至南宋始極其變。（《書東田詞卷後》）

予嘗持論，謂小令當法汴京以前，慢詞則取諸南渡。（《水村琴趣序》）

從詞學史上來看，南唐北宋以小令為主，短小雋美，渾然天成。慢詞雖出現於北宋，到南宋纔取得長足發展，講求章法的開合變化，彝尊所謂的「變」，即指技法上的變化，這是符合實際的。但他所指，與內容並無關，這是要說明白的。

從上面可以看出，欲臻醇雅，其法有二：一、字琢句煉，但要「鏤琢矣而不傷乎氣」；二、章法上「極其變」，但要「綺靡矣而不戾乎情」。前人最善於此的莫過於南宋的姜張，這就是宗法南宋，推尊姜張，標舉醇雅的真諦。

在詞學史上，揭舉雅正並非自朱彝尊始，早在北宋，李清照在其《詞論》中便強調高雅典重。張炎的清空騷雅說，更為朱氏所本。給朱氏直接影響的是邑人曹溶。曹溶於詞求雅正，不主議論，不求淹博，不尚麗藻，不矜小慧，反對「造詞過壯」、「辯言過理」，認為

「豪曠不冒蘇辛，穢褻不落周柳者，詞之大家」（以上均見其《古今詞話序》）。這樣，就確如朱氏所云：「吾最愛姜史，君亦厭辛劉。」（《水調歌頭·送鈕玉樵宰項城》）

汪森論彝尊所選《詞綜》，「庶幾一洗《草堂》之陋，而倚聲者知所宗矣」（《詞綜序》）。是就其實績而言的。它最終廓清了《草堂詩餘》的不良影響，結束了詞壇的歧見，走上一統的醇雅之路。

朱彝尊努力鼓吹自己的詞學主張，寫序作跋，諛揚同調，編輯《詞綜》，示人典範，從而得到廣泛的響應，最後連陳維崧也「謂爲篤論」（《書東田詞卷後》）。然而「錫山顧典籍（貞觀）不以爲然」（《水村琴趣序》），納蘭亦鄙薄《詞綜》，譏爲「黃茅白葦」（《與梁藥亭書》），可見當時意見並不完全一致。不過詞風消長變化的趨勢，絕不因反對者的說長道短而中止。彝尊的醇雅說，既投合當時一般文士的思想藝術情趣，又順應特定歷史時期統治者的需要，因而天下嚮風，勢在必然，在詞史上開闢了一個新時期。

以前論者指出朱氏輯《詞綜》，隱然有開立宗派之意。焦循《雕菰樓詞話》說：「近世朱彝尊《詞綜》，規步草窗，學者不復周覽全集，而宋詞遂爲朱氏之詞矣。」況周頤說：「《歷朝詞綜》一書，以輕清婉麗爲主旨，遂開浙派之先河。凡所撰錄古昔名人之作，往往非其旨者。」（《詞學講義》）確實道出了朱氏用心之所在。

但建立詞派若僅限於地域觀念，對於這個流派的发展是不利的。康熙十六年（一六七

七）龔翔麟編《浙西六家詞》時，陳維崧在《序》中除了點明浙西詞派的地理和風格因素外，還特別提出：「倘僅專言浙西，諸公固是無雙；如其旁及江東，作者何妨有七。」這不能僅僅視為非浙西人的陳維崧要求入派，重要的是浙西詞派在新形勢面前將如何邁步，以求得更大發展。後來朱彝尊在《魚計莊詞序》中說：「在昔鄱陽姜石帚，弁陽周草窗，西秦張玉田，咸非浙產，然言浙詞者必稱焉；是則浙詞之盛，亦由僑居者爲之助。猶夫豫章詩派不必皆江西人，亦取其同調焉耳矣。」跳出狹隘的地域圈子，以同調相求，這是壯大浙西詞派的重大步驟。

浙西詞派的發展是與後繼者的努力分不開的。經過李良年、李符、汪森、沈皞日、沈岸登等的勤奮耕耘，又經過厲鶚、張奕樞、王昶等的澆灌嫁接，浙西詞派於是籠罩詞壇，風靡天下。

然而，朱氏的詞論體系是不完善的。

首先，他對詞這種文學樣式的認識是意欲尊之，實則卑之。請看下面的幾段引文：

《南風》之詩，《五子之歌》，此長短句所由昉也。（《水村琴趣序》）

（詞）極其能事，亦足以宣昭六義，鼓吹元音。（《靜惕堂詞序》）

詞雖小道，昔之通儒鉅公往往為之。（《紅鹽詞序》）

通過詩詞的淵源同、功用同、作者同，以爭得詩詞的地位應相同，就算達到了尊體的目的。